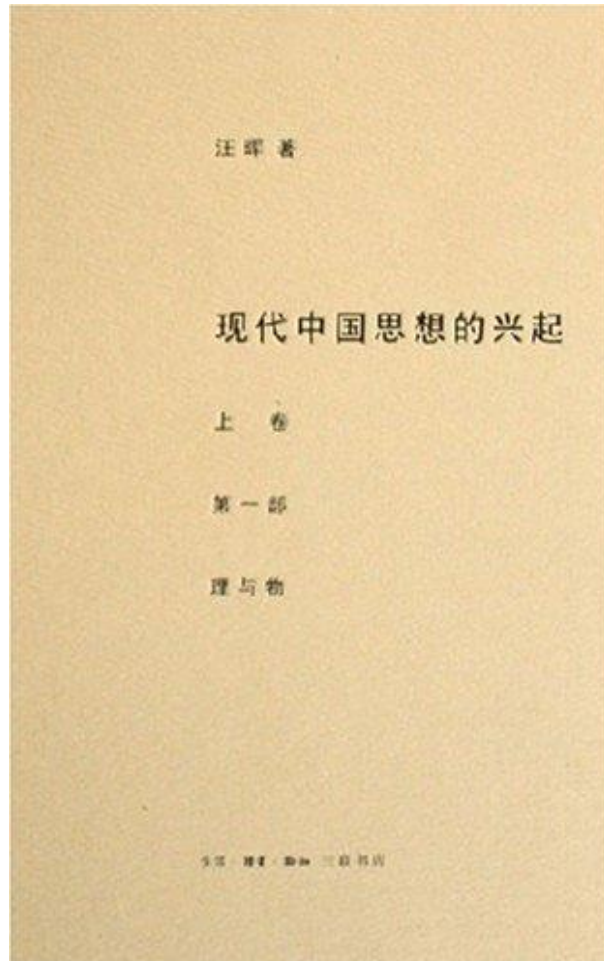


汪暉的生命与思考

汪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當代中國文學和思想史等多個方面。2015 年 12 月 15 日，在中國廣東省從化，汪暉老師接受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劉健芝教授的訪問，討論關於發展及生態的議題。



劉：汪暉，我還想問一下關於生態的問題，為什麼你會那麼關注水壩的問題。

汪：這實際上有一個從書本到實踐的過程，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我自己做這個思想史研究的時候，其中一個課題是對近代科學和科學主義的討論。我在《現代中國思想興起》的第四卷幾乎整卷都是討論這個問題，而且開始的是比較早的，1990 年前後就已經開始這個討論了。這個討論一定程度上有它的歷史脈絡，我覺得是歷史跟理論的脈絡，在思考這個問題。對於科學主義的討論很自然的一個部分是關於思想、世界觀、價值觀，一個是關於現實，就是我們現代社會的基本構造是按照這個結構來的。也就等同於開始了一個對發展主義的基本思考，對於現代化過程的思考。因為我們從 80 年代以來，現代化就是一個最主導的意識形態，當然可以說 100 年來都是如此。我大概在 90 年代的思考當中一個很主要的思想脈絡，就是重新反思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從理論上說這也就不可

避免地追溯到這個過程。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對於資本主義的再思考、資本主義的研究來說，我的確認為現代生態危機是跟資本主義發展連在一起的，因此這兩個方面是相互關聯的。所以我自己90年代做這個關於科學問題的討論的時候、科學主義的討論的時候，實際上是包含這個脈絡。因為對於自然的控制，也是對社會的控制的一個方式，這個（是）過去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一個命題。我也是相信在這個意義上，因為我們對自然的爭奪同時等於社會和政治的結構都是跟它發生關聯的，人和自然的關係反過來是人和社會的關係，這一點是很早就開始思考的。



費孝通先生

以後捲入到這個生態問題的運動裡面，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我在96年開始編《讀書》雜誌，編《讀書》雜誌以後，我對這個所謂現代化的再思考、發展主義的批評實際上在《讀書》裡面已經在組織這些討論。當時我們也組織過幾次專門的關於科學主義、發展主義的圓桌討論，在《讀書》上發表過關於科學主義、人文地理、科學和科學史問題，也包括鄉村發展，都涉及發展模式問題，其中也包括生態問題。那個時候中國知識界對這個問題不能說沒有關注，但是不夠重視，我印象中反而是老一代的一些學者對一些具體問題有思考，我印象比較深的比如費孝通。他對太湖流域的調查，對太湖的污染情況的分析，另外他強調太湖周圍人口密集，人的污染高於其他的污染。這個《讀書》後來都發表，沒有引

起應有的重視，後來藍藻爆發各個內湖全部污染。再就是我們曾經發表過一組黃萬里的文章。黃萬里是當時對黃河三門峽提出異議的一個科學家，以後在長江三峽問題上，他又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那時候在他的晚年，留下了一些稿子，所以我們就發表了他的這些稿子，不是遺稿，當時還在世，他的最後一篇文章是他去世後才發表出來，是他的遺稿。還有一篇是直接討論長江三峽的文章，是他的遺稿，沒有能夠發表，因為太現實，比較尖銳，沒有發表。我自己在《讀書》的編輯手記裡面也專門寫過關於黃萬里和這一類生態有關的文字。我們大概在 90 年代，我編《讀書》期間也曾經參與過到長江的考察，我們跟一群研究長江問題的人。他們主動來找我，因為《讀書》發表了這些文章，他們就主動來找我們。所以我跟著他們一起去長江沿岸，去看過，然後也專門參加了他們的討論會，一些水利的這些。基本上有兩種理論，一種是進一步現代化，為了解決水資源，但同時也發展出怎麼樣保護生態，這是第二個因素。



已故人類學者 蕭亮中

另外一個因素可能是 96、97 年我在香港的時候，跟你、寶強，我們一起，《發展的幻象》那本書其實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的，是吧？對於發展主義的分析我覺得當時寶強和你的思考已經是比較深入的，比較全面的，那時候參與大家一塊兒討論，以後我從香港回來我們一起編這個書，我記得編這書的過程中《大壩經濟學》不是放在我們這一套，也是我拿到後來給了另外一個出版社，最後出版了。金沙江問題的時候，蕭亮中買了好多《大壩經濟學》分送給這些人。這是之前的脈絡。

之後的脈絡就是我自己和當時《讀書》的關注當中除了生態問題，還有一個是關於文化多樣性的問題，就是對各個民族地區的生態進行觀察。黃平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為他是社會學家，他也跑過很多地方。那個時候我們就做了一個叫做《田野雜記》去研究各地方地域的文化，因為我們逐漸形成了一個基本看法：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是密切相關的，這個也跟我以後研究討論區域這個問題有關係。因為區域是一個生態、人文都綜合在一起的一個概念，不是可以區分開來的一個概念。大概是在 2002、2003 年前後，蕭亮中來找我，當時他也在《讀書》上發表一些文章，他來找我，他說我們談過關於西藏問題的一些討論。那麼那一年在雲南，有一個關於藏族文化和生態多樣性的一個學術會議，他們邀請我去，我也說我不是藏學方面的專家，也不是生態方面的專家，但是我有興趣，他們要我去我也就跟著去了。去的過程中除了參加這些會議，因為那個會議很有意思，除了一部分跟西藏文化有關的，有一批在雲南活躍的 NGO，實際上都是以環境問題為中心的，後面分組的一些討論他們都參加了。當時我就注意到這樣的一些狀況，像大自然協會他們也是在地化的，他們這些幹部實際上是當地各民族的成員，所以聽到他們的一些討論。以後我又有機會跟這些藏學家還有活佛一起去德清，然後去梅裡雪山，所以一路跟這些，主要以藏族為主的少數民族的一些人座談，討論當地的生態、文化、土地政策等等。



虎跳峽

最後，在那次會議過程中我第一次聽說有這個虎跳峽建水壩的計畫。當時就跟蕭亮中他們談過，問過這個問題，我記得走到貢子蘭，他們說這個地方可能以

後都要淹掉。（我）覺得非常可惜，因為這個對生態多樣性、文化多樣性都有影響，再說虎跳峽是一個著名的大景區。我回到北京以後，蕭亮中當時就跟我商量能不能做些事兒，我說我不是特別瞭解這情況，所以我就跟亮中說你要不先做點調查，你先期的，我後來。他是當地人，所以他留在當地去調查各方面的情況，我也介紹他一些人，當地政府的一些人，讓他去跟那些人接觸，看看到底什麼狀況，因為你要說話總要做點調查。我回到北京，他經常打電話說這個狀況是怎樣怎樣，就希望我能做一點事，而且希望能產生影響，要不然整個虎跳峽就破壞了。那我說既然要說話，我又不是這個領域的，我還是覺得很為難，然後我當時還是不管怎麼說決定我自己去做一遍考察。這樣我就又找了一個機會自己去，當時是夏季，所以（因為）雨水那個地方比較危險，虎跳峽山上掉石頭非常危險，而且公路也斷。我自己步行穿越哈巴雪山，我一直走進去，沿著這個虎跳峽，上虎跳，中虎跳，下虎跳，沿著走了一遍。走了一遍後當然也再做一點其他的文字的調查，這樣的話就對這個情況有了一些比較第一手的接觸和瞭解，也跟當地一些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作了討論。之後我們就在北京召開了一次會議，其實當時參加會議的大部分是環境的 NGO。這些 NGO 當時做了一些地方性的東西，但是始終沒有這麼大影響的，能夠把大家團結起來的這麼一個活動。而且這個活動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第一次，主要是由於蕭亮中的原因，他是當地人，又涉及到金沙江峽谷地區的這些民族的生存狀況，所以他在北京跟金沙江之間穿梭往來，其中使得當地的農民，因為它做這個要牽扯到大量的移民，它因為牽扯到這些狀況，這個當地的村民開始主動地參與這個事情，所以這件事情對當時的環保運動來講，也是一個重要事件。原因是第一次真正的由村民們自己組織起來對自己的生存狀態要發言，同時又跟其他的一些從事環保運動的人，還有一些，我們這些並非職業的從事環保運動的人。我們當時做過一個公開信，海內外都有一批人參加，這個公開信的發表，和當時媒體的報導，國內、海內外媒體的報導使得金沙江問題成為很重要的問題。那時候國家在這方面相對的說容忍度比較寬，我記得有一年國務院發改委搞一個電力改革的國際會議，好像是哪個國際組織跟國務院發改委聯合搞的。我們當時把金沙江河谷地帶一個村民的代表請到北京來，他在這個國際會議上發表了講話，而且當時的報紙，像《中國青年報》，都是頭版，一個村民的大頭像在那個國際會議上發言，海內、海外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客觀上也起到了一點效果。最後，金沙江水壩的建設尤其是虎跳峽項目變更了，它的位址改掉了。金沙江還是需要水壩，它是在上下虎跳還是有，但我們的努力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長江三峽水電站

因為我們現在的生態問題基本上以碳排放為中心的，但我們中國的碳的依賴量高，過去高到 70%、80%，現在比較低了，大概 50%多一點，起碼一半以上，仍然是要大規模依靠碳。那我們現在使用碳的清潔技術目前在全世界都是領先的，這都是事實。但是也碰到一個問題，因為我們要（降低）碳排放以後，所以大家覺得水力是唯一的清潔能源，當時還有一些人提出核能源還是可以用的。可是因為福島危機之後，大家也知道它也是哪一天要爆發了就不得了。一方面是核能的不可靠，它總說是安全的，誰也不敢預估，第二個是有一個碳排放的標準，這樣水的壓力、水電的壓力、水利的壓力就變得很大，這對中國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般來說把水電當成清潔能源，可是水電碰到的問題一個是破壞江河的生態，第二個是涉及大量的移民問題。長江三峽當年是這樣，現在的這個怒江啊其實都涉及到移民和移民安置。同時這些地區又因為它是多民族地區，它當然也會涉及生產方式和文化多樣性的問題，所以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再加上這些地區的河流有多半是國際河流，它不是一個國家的，還牽扯到國際間的關係。所以這個過程裡面有非常複雜的，客觀上講生態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不僅僅是現代化、發展主義這些問題，還牽扯到更加複雜的政治問題，這也是以後我們做過的一些工作。

最近剛剛結束巴黎氣候談判。5 年前在天津也有一次氣候談判。當時有一批人，長期從事這個工作和研究的人提供了這些最基本的數據。我跟鄭義生我們一起牽頭找了一批人，給當時的中方談判代表薛正華，也是這一次的主談判代表，和美國方面的談判代表各自寫了一個公開信，這個公開信在國內國外都發表了。最近我看他們又有人把這個 5 年前的信翻出來，因為基本的問題沒改變其實，談來談去基本問題沒改變，而且現在說是達成了共識，但實際上美國在這方面的責任也完全沒有盡到。中國方面不能說不重視，相比較中美兩國的話，中國方面的重視和推進從政府的努力來說、從社會的關注度來說，跟過去相比，那還是做了

大量的工作，這也是實事求是，是有大量資料的。可是我們也看到，作了這麼多的努力，國際談判當中作了這麼多的妥協和讓步，但是我們的生態還是在持續地惡化，霧霾持續嚴重，也就是說這是遠遠不夠的。



北京霧霾問題嚴重

這個不夠不是意識的問題，是發展模式的問題。你只要在這個模式下，只是用修補的方法就是很難解決這個問題。美國跟歐洲發達國家推卸它們的歷史責任，在當代承擔的責任也不夠。由於它們在這個談判當中對媒體和 NGO，它們處在比較有利的地位。尤其是最近五、六年來，對於發展中國家，中國（和）印度的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能夠真正地推進生態的改革，全球性的，包括我們國內的改革，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生態的問題。

關注生態不僅僅只是一個生態問題，我們通常說的環境問題。那我補充一點的就是當時，我忘了是在哪年，《天涯》雜誌發表了《我們為什麼要討論生態》，當時黃平，李陀，少功他們組織了那個會，我不在，沒有參加。這說明當時對環保問題的關注是中國知識界集體的圍繞環境問題發出聲音。另外，我們在《讀書》組織有關生態的討論，有一些老先生，他們就說你們這些討論都走得太快了，這些問題都是發達國家的問題，不是中國的問題，所以意思是說中國現在主要的問題是發展的問題。我們並不是說發展的問題不重要，可是發展模式的問題是一個核心問題。這是當時為什麼捲入生態問題的一個因素，還有很多。

从虎跳峡实践之后，中国包括北京，媒体和 NGO 对环境的介入越来越多，也引发很多各种各样，客观的说也有不少问题。就是这么卷入的一个过程。

刘健芝：能说一下你的那种人文关怀跟你读鲁迅或者其他有什么关系？

汪暉：我很難具體的講，跟魯迅，跟什麼都有關，但也很難說直接的關係。整個

20 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就是關心自己的社會命運，也關心世界。這是這個時代的基本氛圍，不是我一個人的，是某一種時代的氣息，大概要到過後我們回想、比較幾代人的時候才會發現你身上的一些東西也跟時代的氛圍有關係。我自己比較關心比如民族問題等，這些都跟 20 世紀的政治傳統有關。看不同的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他們的生存狀態。另外一方面也關心發展中的中國在世界關係中的位置。生態問題、民族問題都不只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也都不只是生態和民族問題，都牽扯到其他非常複雜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關心，或多或少是我自己思考和進行學術研究的動力。許多的問題大大超出我最早的學術訓練，不得不沿著這些問題去閱讀、思考和做研究，慢慢這也就成了一個常態。

劉健芝：你研究思想史是想思考當代的問題，能不能說一下。

汪暉：最初涉及到清代的思想，我說過我好想有點倒著走，因為我過去的研究集中在 20 世紀。研究魯迅，研究現代文學，研究五四。因為研究魯迅，會研究章太炎，嚴復等涉及到的其他思想家。五四一帶，晚清一帶，這麼做下去。研究晚清思想的時候就不可能不涉及更早的學術史和思想史，尤其是在儒學的氛圍裡。因此這個研究就會展開。

清代的思想比較特別的一點是，清朝是一個少數民族統治的王朝。它的內外關係跟宋和明有區別。清代涉及到的蒙古問題、西藏問題、西南地區的問題，在加上它和周邊國家關係的問題，是在演變中的。我在做清代思想的時候，意識到僅僅在舊的，比如以儒學一個框架或者某個一個思想脈絡來做，就非常不夠。因為研究這段歷史，就不得不閱讀大量的關於蒙古、西藏等這些地區的東西。理藩院涉及這麼多歷史，西南院也是如此。這些我們過去注意的比較少，思想上不能說沒有涉及，學術上真正的閱讀很少。我後來寫過“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的時候，其實一個學術的脈絡確實是在研究清代的時候閱讀了一些東西，發現清朝要處理這些內外關係的複雜問題，我不得不去讀。它也引申到怎麼去理解當代的這些關係，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線索。這寫線索中還有一個背景是對於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再思考。在這個脈絡下才意識到政治共同體的政治形勢是完全在這個時期重構的。一方面它跟過去的歷史有非常深刻的延續性，就是中國的現代國家也是建立在清代的人口和地域的構造上的，很多處理的方式也是從中國傳統裡面來的。另外一方面它的基本主權構架是世界體系的一部分，世界關係的一部分，是通過列強所強加的條約體制重構出來的。內外關係就在這個過程當中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我自己在 90 年代開始對科學主義也好、發展主義也好，這套意識形態也好，它植根的基本框架是民族主義、民族國家，所以慢慢開始思考怎麼去思考民族國家的生成，它跟歷史的關係就成了我在一定時期內討論的中心問題。所以我自 90 年代後期研究清代經學的時候提出破除帝國和國家的二元論，從新解釋

中國歷史的這些問題。現在這個話題已經變得很多人在談，實際上當時很少。我做的現代中國思想興起裡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解釋所謂的帝國、國家二元論的形成和它在解釋歷史上的缺陷。現在很多人把我對帝國、國家二元論的分析簡化成為用帝國來取代國家這個完全不是我的基本論述。我們分析的是這個二元論是怎麼構造出來的，它在理解歷史時候的局限性。因為國家的形態在中國有非常長的歷史。當我們說中國清朝帝國的時候，實際上它內部既有國家的形態也有今天我們放在帝國範疇內的形態，這是非常複雜的歷史關係。

那時候之所以會對類似於帝國這樣的問題感興趣，主要還是它對多樣性的容忍程度。在 20 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浪潮裡面，民族主義的極端化就是德國的排猶（太人）這樣種族主義的，在歐洲造成了極大傷害，對中國也並不是沒有影響。在亞洲地區的日本是典型的例子，就是種族主義為內核的民族主義。因此很多歷史學家，過去我們批判早期帝國政治上的專治主義，但是也注意到莫臥兒帝國、奧斯曼帝國或者其他的帝國體制下，它對少數民族存在過壓迫和這些。反而很少出現類似於 20 世紀歐洲排猶這樣的極端化的種族主義。這是跟民族主義有關係的。這也是思考現代性問題裡面的要素。

我對明清之際的轉化，和更早的對中國思想分析，實際上還是圍繞著對現代問題的再思考來展開的。它涉及了不同方面，剛才說到的生態、文化多樣性是這個思考中的一個要素，在現實中跟運動界和起來。但還有一些問題不完全如此，我後來關注西藏、新疆問題，寫出來是受到事件的出發，寫“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很顯然是受到 2008 年 3·14 問題的觸發。我去新疆也是 2009 年 7·5 事件之後，實際上我在知識領域的思考要比介入這個過程早很多，只不過我不是西藏問題專家，也不是新疆問題專家，我並沒有打算完全把它變成一個專門的討論物件，我還是把它放在對整個中國問題思考內部來看的。但是由於問題的緊迫性，就不得不同時進行知識的介入。怎麼理解，你需要提供一個知識的視野。我後來的寫的東西跟這個過程有關係。我以後提出所謂的區域作為方法，講從區域的角度，不是簡單的從民族、宗教的角度，而是從好要素，自然、人文、社會要素，不同族群相互關聯的要素，不是從單一族群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區域問題是跟歷史有關的。我經常講的一個故事是，在金沙江流域第一次接觸明顯的問題。雲南地區文化多樣性非常高，它的生態跟文化多樣性密切連在一起。以蕭亮中來說，他的家庭裡面有白族、納西族，他夫人是回族，可能還有彝族的因素。他們的家庭當中，包含的成員有四個族群。他的同學，西藏的馬建中跟他好朋友，這些人又是藏族的，當地原來木府到底是納西族，還是有藏族、漢族，其實不是完全說得清。在當地有很多這樣的情況。在研究所謂多樣性，我以後也提出多樣性不能解釋成一般意義的多元性。圓，一個個的，可是一個圓也是多樣的，不能簡單地把它單極化。這些問題跟生態和生活方式有關，另外也跟我們的思考有關。當我

們看這些現象的時候從哪出發，是從族群的角度還是甚麼角度。我比較追求一個相對綜合，這個關係本身構成思考的前提，因為你不能把這些東西完全拆解開來，在其他地區也包含這樣的方法論要素。當代的社會衝突和民族衝突，除了當地實際的社會問題之外，也跟我們怎麼理解這個問題有關。這個理解最後會變成當地人自我的理解，因為這些都變成好像共識，你是什麼，我是什麼。我們怎麼去重新理解這些關係，甚至理解多樣性的概念，因為多樣性也會變成另外一種概念。多樣，你是你，我是我也可以是一種多樣。還有一種，我後來提過一個範疇叫跨體系的社會。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是，我也很難說得清楚我是誰。在這個意義上，你離開自己的交往（圈），不能只說自己的父母是誰，祖先是誰，塑造你的是各種各樣的元素，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在這樣的關係當中。在這些地區，族群、生態、宗教，尤其有著重要的作用。它是連接的要素，同時也是身份認同的根據，同時也是連接的要素。關鍵的問題是怎麼去把握這些在歷史內部的要素。這些思考慢慢變成我思考歷史也思考現實關聯起來的一個方法。我看歷史甚至是閱讀經驗。我過去常舉的一個例子敦煌，有很多發掘的卷子。你要理解這些卷子，就要像考古一樣，敦煌有不通順時期的，唐代中期、晚期，更晚到元朝前後的，以後就沒有了。如果你只是看表層，只是一層，裡面還有一層，還有一層…閱讀一個文本也好，理解一個現象也好，其實是多重的 layers。它開頭是一層層的，以後變成一個綜合體，因為這是動態的，它畢竟不是牆壁，它是一個活著的要素。這些慢慢成為我思考歷史問題、區域問題、生態問題或者這一類問題方法上的視角。

劉健芝：我們知道你除了去歐美，還去很多亞洲、拉丁美洲、非洲的國家，這種經驗對於你思考什麼是國際主義有什麼影響？有些人談國際主義也可以是很虛的，有些人可以說多元性，可以是個很空的範疇。你也會自認是一個國際主義者，是吧。

汪暉：國際主義是 20 世紀中國政治傳統的一部分，當然是世界運動歷史的一部分，當然它也是 20 世紀中國現代傳統最深刻的一部分，也值得珍視的一部分，魯迅如此，毛澤東也是如此，你可以說也包含了孫文。這是從被壓迫民族解放出來的民族之間的一致性，共同地位的出發來思考這個問題。所以國際主義是現代中國的一個政治傳統，或多或少這是在過去 30 年當中被否定遺忘的傳統，需要重新發掘的傳統。

尤其在學術圈，國際主義當然也是一種政治正確性，因為民族主義，尤其是過度的民族主義在過去的學術圈常常被批評。關鍵的問題是一樣，我覺得國際主義也好，關於不同民族的再思考也好，少數民族怎麼去理解生態，跟國際主義是一樣的，在我看來這個邏輯幾乎是一樣的邏輯。我的很具體的感覺，隨著我接觸的來自不同地區的人，這些成為我個人的朋友，我也從他們那學到很多東西。每

個人都有他的主體性，主體性的塑造很大程度上是看你跟別人的關係。不是你自己可以單獨的，而是你建立什麼樣的一種關係。這些關係的豐富性最後成了你的主體性的一部分。過去我們很少真正接觸到，特別是底層世界，以歐美為主。但歐美有很多人是國際主義者，我們也接觸到很多朋友。以後我有機會去拉丁美洲、非洲、亞洲地區，接觸到完全不同的視角。對我來講有兩個要素，一個要素是隨著你對社會的認識往往是跟你接觸的朋友們有關的，他們帶著你進入對那個問題的關注。你開始因為無知沒有能力去真正認識這個社會，多半是這樣的運動帶著你去接觸。而你之所以認識這些人，常常是因為你們有共同的一些物體。這些社會所面臨的問題跟我們的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之間，並不是無關，有時候是非常一致的問題，有時候恰恰是由於這個關係造成的。你這個國家跟那個國家互相變成問題。無論如何這些相關性就出來了。你帶著這些問題，當然就會介入這些社會的討論。

我們編《讀書》的時候，《讀書》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讓不同地區的人都參與到中國學術界的討論裡。有歐美的作者，有日本的、韓國的、其他地區的，國內是臺灣、香港，很多學者都參與這個討論。這麼大規模的不同視野介入到中國知識界討論，我的看法是，一百年來恐怕都很少。這樣對於共同問題的討論，其實都是比較少的。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自己也思考一些中國社會面臨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我自己在方法上慢慢發展出的一些東西，去尼泊爾、印度、委內瑞拉或者非洲，常常會從他們面臨的問題回去思考中國歷史上一些特殊環節、特殊階段面臨的問題，你怎麼去解釋它，怎麼去解釋中國歷史。過去在中國的社會脈絡關係中，有些問題恐怕不會這麼提、這麼看，換到一個很具體的社會衝突語境中，再回過頭來看中國歷史和政治脈絡，有時候幫助我提供了一個歷史理解的可能性。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去尼泊爾的時候正是毛派剛剛執政的那年，毛派執政有很多跟中國的相似性。10年人民戰爭，我們經歷8年抗戰，然後土地革命，他們是經歷了10年的人民戰爭。人民戰爭結束後開始議會道路，到底是走和平民主新階段，還是繼續武裝鬥爭奪取政權。這種爭論在中國1945年早就爆發過，在尼泊爾再度爆發。我們圍繞20世紀中國這些歷史環節，歷史學家也有過很多爭論，這些歷史學家的政治也反映出了政治的爭論。從新看待尼泊爾的這場鬥爭，幫助我們理解這個階段的問題。到委內瑞拉，查韋斯我們很清楚，他是一個有魅力的政治領袖，非常善於動員群眾，跟群眾互動，但他的政黨高度的官僚化，很多的投機分子。在這樣的條件下如何維繫和推進他的激進的政治改革方案和社會改革方案，變成了一個非常嚴峻的社會政治問題，劇烈的挑戰。我對他有很多同情，同時也知道他面臨的最真實的困難，這個在當時可以看得很清楚。

回過頭來看中國自己經歷的過程，尤其是1960、1970年代或者文化大革命，或

者諸如此類，你去研究中共的政治領袖、政黨和普通群眾和激進政治，這幾者之間的關係是幫助你去理解這些要素的。我對於這些地區一方面是關心這些地區的問題，但也時不時把這些問題拉回到我們的歷史脈絡當中來加以思考。對我來講，看這些國家、地區的問題，漸漸地不再僅僅是關心別的國家，也關心我們自己，這個分析自我理解方式。漸漸地這些問題之間完全隔開的狀態好像慢慢消失，問題湧現的時候，就自然的找到相關性。

我自己觀察西方也是，美國、歐洲的問題也是如此，也發現很多的差異和重疊。研究歷史、研究政治都會發現很多人強調共同性，或者有的人強調截然不同。但是在某些歷史時刻，常常是被看成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說中國跟西方的政治體制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它面臨的挑戰是空前相似的。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狀況，中國跟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形式、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差別也很大，可以你可以找到大量的重疊性的關係。那些方面發生的重疊，哪些方面發生了差異，它在這個關聯怎麼去思考。對我來說，這變成了一個至少現在來說是一個常態。也因為這樣的原因，我當然不是任何一個其他國家的專家，但是有時候由於這樣的思考，它所帶出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不是通常的區域研究可以看到的。在我的視角裡，是跟我們的歷史密切相關的。有時候也能產生出這個關聯，很有趣。

最近寫尼泊爾的文章，回憶當時 2008 年去尼泊爾跟普拉昌達談話的時候，我給他提出幾個問題，他說你好像對尼泊爾的情況很瞭解，事實上我對尼泊爾的情況不瞭解，只是很初步的。可是為什麼他會這麼覺得，是覺得這些問題都是中國有過的問題。我知道這個差別在哪，實在的差別，其他的差別。你之所以對它有一定的歷史和理論的再理解，是跟中國歷史有關的。反過來，當你更深的理解了他們面臨的挑戰和危機的時候，你可以重新形成對自己歷史的判斷，這個視角是一致的。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下，你跟這些地區之間產生了更深的關聯。坦白的講，不管我走動多少，主要工作仍然是一個學者的工作。這個是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基礎的，做老師，做學術研究，我不想說我自己已經變成一個純粹的人，事實上我沒有。但是這種聯繫的紐帶的深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你是否每次都都要在那個地方才能進行。我在清華組織的很多討論，我們那個高等研究所的很多活動都是跟這個脈絡有關的。很多人覺得為什麼你們這些早的人完全沒有在一個學科領域裡面，一定程度上跟我們思考這個世界是有關的。用這樣的方式能夠讓我們的學生有不同一般的，每個學者都有自己的學科領域，但他的思考方式不能夠完全局限在學科領域裡。可是你要超出這個學科領域，不是在學院裡談論科技整合就可以的，這個關聯是歷史性的，也是你經驗的一部分。你只有介入到過程中去，才能成為你思考的一個方法。這樣使得你不斷觸摸你自己知識的邊界，就會發現好多東西你都不懂，好多東西都是走到一個地方就卡殼（卡住）就不知道了。這

個變成你行動和思考，包括閱讀，是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攝錄：歐陽麗嫦

視頻整理：李翹志

文字整理：靳培雲

全球大學

網址：[http:// our-global-u.org](http://our-global-u.org)